

中国传统文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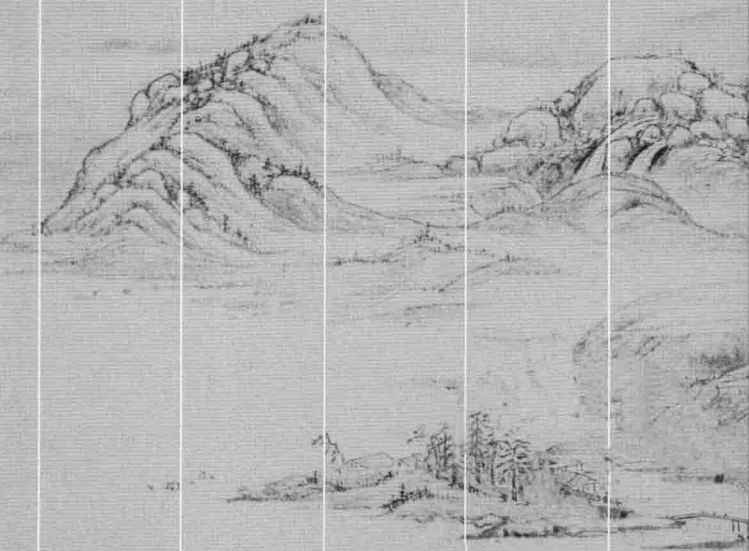
王善禄
著



齊魯書社

中国传统文化论

王善祿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论 / 王善禄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3. 12
ISBN 978-7-5333-3024-8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21488 号

中国传统文化论

王善禄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024-8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经济生活论	1
第一节 生产工具的演变及其影响	1
第二节 生产方式的固化及其影响	6
第三节 古代科技的发展与质变的困难	11
第四节 衣食住行述论	29
第二章 政治制度论	69
第一节 君主专制的演变及流弊	69
第二节 选官制度的进步与局限	85
第三节 谏官与酷吏文化及影响	93
第四节 外戚与宦官文化及影响	108
第三章 军事策略论	136
第一节 先秦军事思想概述	136
第二节 秦代至清代的军事思想概述	140
第三节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基本特征	143
第四章 传统思想与宗教信仰论	147



第一节 丰富的传统思想	147
第二节 不发达的宗教	191
第三节 复杂的信仰	202
第五章 文学艺术论	205
第一节 诗词之美	205
第二节 散文之美	227
第三节 小说之美	248
第四节 戏曲之美	281
第五节 绘画之美	289
第六节 书法之美	303
第六章 社会习俗论	317
第一节 婚丧嫁娶的文化观念	317
第二节 常见习俗	327
后 记	338



第一章 经济生活论

第一节 生产工具的演变及其影响

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了元谋人的化石,随同这些牙齿化石,我们还发现了元谋人制造的生产工具,比如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它们分别用于剥皮、破骨取髓和挖掘植物等。这些用简单的打制方法制作出来的工具,我们称之为旧石器。在漫长的100万年间,人们一直使用这样的石器做生产工具。直到生活在距今28000年左右的那个时代的陕西朔县峙峪人,仍以这样的旧石器做生产工具。但是,在狩猎的技术上,人们在狩猎工具的制作上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1963年,在峙峪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石镞,说明这一时期的人们已经发明了弓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评价说:“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长期积累的经验 and 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又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的发明是古代人类征服自然

的一大进步。

距今约 1 万年以后,生活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中的山顶洞人,创造了另外一个划时代的发明,那就是钻孔技术。考古工作者在那里发现的骨针,长 80 毫米,最大直径 3.3 毫米,用于缝制衣服。这种骨针是经过磨制的,有钻孔,可以将线绳穿在针上,便于用针导引。

不久以后,人们将磨制技术用于石质工具的制作,打制出了石斧、石镰、石铲、石磨盘和石磨棒等。从公元前 1 万年开始,处在不同地区的人类先后用上了生产效率更高的磨制石器,我们称这种石器叫新石器。新石器制造技术的出现实际上是采集业向原始农业转化的一个必然要求。我们从考古发现的生活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居民所使用的石器工具上,可以感受到他们高超的石器磨制技术。我们看到所有的石质工具至少有一个面是磨光的。到公元前 6500 年左右,即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也即北方的仰韶文化和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又将钻孔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劳动工具的制作上。他们在用一块石头磨制的石铲上钻出一个孔,把一根棍子用绳子通过这个孔捆绑在石铲上,复合工具就出现了。我们在半坡遗址发现的用于翻土的石耜就是这样的工具。复合工具出现的意义不亚于弓箭的发明。

新的农业工具出现以后,原始农业发展成为“锄耕农业”。这一时期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生产工具还有陶器,比如陶刀、陶镰,用于收割庄稼。

在我国,金属器是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出现的。在甘肃东乡的马家窑发现的青铜刀、在烟台杨家圈发现的铜条和青岛市胶南市发现的铜质钻型器等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但是青铜器在当时甚至在以后 2000 余年间都不曾在农业生产中担任过生产工具的主角。不管是最先的红铜还是后来的青铜,这种比较昂贵的金属

多是被奴隶主用来制作酒器、冥器或兵器的。夏、商、西周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还是以石器、陶器、木器或骨器工具为主。

至于铁器,目前看来,最早可能出现于商朝。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刃部竟有一层锈铁,可能是用陨石铁锻打出来的,说明商代人已经对铁有所认识。可以确认的人造铁出现于西周末年春秋初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上岭村两座虢国墓地遗址中发现了一件玉柄铜芯铁剑,经鉴定是我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进入春秋,铁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了。那时候,人们把铜称作“美金”,把铁称作“恶金”,《国语·齐语》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斲,试诸壤土。”说明那时候人们已经用铁铸成锄夷斤斲之类的工具,用于田间农业生产。这表明生产力发生根本性进步的时代已经到来。只是春秋初年,铁器还仅仅是用在一般的农业工具的制作上,比如铁镢、铁铲和铁镰等。

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工具是犁。春秋初年的犁可能主要还是木制的。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史上劳动人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牛耕可能已经实现。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家族可能率先使用了牛耕,“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①。晋国士人名司马耕,字子牛,也把牛和耕联系在了一起。牛耕的出现是仅次于蒸汽机的发明创造,是人类第一次把一种非人力的动力引入到人的劳动中去,这是生产力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进步。到春秋末年,人们将木犁头换成了铁犁头,从而完成了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革命性的进步。到战国,铁犁和牛耕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了。在秦国,“以牛田”^②。

^① 《国语·晋语》。

^② 《战国策·秦策》。

已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铁器,分布非常广泛。北到辽东半岛,南到湖南长沙,东抵山东广大地区,西到甘肃平凉,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的发现,包括铁犁。铁犁和牛的联合使用,完全改变了当时流行的很重要的经济关系,这是因为铁犁和牛耕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价值。随着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可以在更大面积的土地上进行生产,拥有更多的土地意味着就拥有了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就引发了人们对占有更多的土地的兴趣,人们为争夺土地的斗争日益激烈。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田里不鬻”原则开始受到冲击,人们千方百计地通过转让、赠与、私自开垦或其他变相的方式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并最终迫使各诸侯国承认了土地私有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进程。土地私有化的实现,使得历史的发展重新获得了一个根本性的发展动力。

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少年时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西汉王朝建立之后七十余年,长安的藏粮情况是“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①,证明当时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农业的进步,首先应该归功于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西汉的铁犁形制多样,有尖锋双翼犁,有舌状梯形犁等,以适应不同地区的耕作要求。在山东的安丘、河南的中牟和陕西的西安等地,考古工作者均发现了大量的西汉时代的铁犁。西汉的铁犁在原来的犁头上面加了一个叫犁壁的东西,呈展开的鸟翼状,它可以在犁头把土翻起来的同时,借用土壤向上的惯性,把土扬起来,起到帮助碎土和成垄的作用。西汉铁犁壁的出现,证明我国使用这种农具的时间比欧洲早了 1000 余年。

^① 《汉书·食货志》。

东汉时期,铁犁的制造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东汉时期的铁犁分为大、中、小型三种。大型铁犁的长度在 35 厘米左右,中型铁犁的长度在 25 厘米左右,小型铁犁在十几厘米左右。这些铁犁普遍犁锋角度缩小、刃部加宽,并且普遍地使用了犁壁。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东汉墓穴中看到步犁使用的情况,发现西汉时期的二牛三人演变成了一牛一人。因为西汉时期的犁子比较笨重,所以需要两头牛作为步犁的动力。三人之中,其中一人在前头牵牛,以控制牛行走的方向,另一人坐在犁座上,帮助犁子实现深耕,最后一人在后边扶犁。东汉时期铁犁制作的更加锋利,一头牛便可以满足步犁的动力要求,并且可以节省下负责增加犁子重量的劳动力,又由于牛的穿鼻技术的实现,牵牛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人一牛技术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成本。

到唐代,我国古代步犁基本定型了。根据唐代陆龟蒙《耒耜经》的记载:江东人民在稻田耕作中使用了江东犁。江东犁就是唐代劳动人们普遍使用的步犁。江东犁最显著的进步是犁子的直长辕变成了短的曲辕,这使得耕牛用力的着力点降低,可以使耕牛的力量更充分地被步犁吸收,同时也减轻了犁子的重量,操纵更加省力。根据陆龟蒙的记载,江东曲辕犁为铁木结构,由犁铧、犁壁、犁底、压轭、策额、犁箭、犁辕、犁评、犁建、犁梢、犁槃等 11 个部件组成。整副步犁的结构简明扼要,制作方便。在唐代后期的许多美术作品中都可以看见这种步犁的影子。

到了宋代,步犁的结构更加简单,9 个部件就可以组成一副步犁,功能没有降低,制作却更加容易了。直到明清乃至近现代,以至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农耕劳动中,这样的步犁一直是主要的劳动工具。

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很多,步犁最为重要。在农作物生产的三大环节——翻耕、中耕和收割中,翻耕最关键。古代主要依靠

人粪和绿肥来营养耕地,所以耕地的效力就很有有限。翻耕可以上下翻动土地,在不抛荒的情况下,实现土壤上下层的休养生息;翻耕又可以使土壤细化,便于庄稼的根系生长伸展,以充分吸收土壤中的养分;更可以提高土壤的通透性,便于雨水的渗透;还可以起到灭虫的作用。土壤翻耕的好坏决定着后续过程的成功与否,因此步犁也就成为农业生产中起决定性的生产工具。

遗憾的是,自宋代,实际上自唐代,中国的步犁就没有大的改进了。长年累月,近 1500 余年,在农业生产过程的主要环节中,我国劳动人民一直使用这样的步犁。

以步犁为代表的古代生产力,为什么进入古代社会的后期就没有了质的飞跃?或者说仅局限于量变而缺少质变,至最终中国古代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力的进步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生产力为什么没有转化为近代生产力就显得十分重要。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仅从深层的文化角度分析,这与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研究上所秉承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节 生产方式的固化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的生产模式是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

在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以前,没有一家一户的概念。

人类最早的劳动分工是男子负责渔猎、女子负责采集。到公元前六七千年左右,原始锄耕农业在女性们的精心呵护下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全体氏族成员的最重要的生活保障。男子由于自身体力上的优越性,开始在进行渔猎的同时逐步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女子则可以退出农业生产和采集而专心致力于纺织。这种劳

动分工适合两性差异并逐步被固定下来,形成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形式。一家一户的形成比男耕女织要晚一些。在母系氏族社会,人们还没有一家一户的概念,虽然当时是对偶婚,貌似一家一户,但与后来的“一家一户”完全不同。因为对偶家庭不具备任何经济内容,对偶家庭没有任何私有财产,氏族公社才是全部财产的所有者。到公元前 5000 年左右,由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男性手中的剩余财产越来越多,他们希望把这些剩余财产转移给自己的后代,随着婚姻方式的改变,真正具有经济内容的家庭出现了。

家庭在经济上从氏族公社里分离出来,他们分割了氏族公社的土地,并各自规划从事各自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至迟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这样的家庭遍地开花。这一时期或更早一些的墓葬文化有着明确的反映。我们看到原来个体的、基本没有陪葬品的墓葬慢慢地淡出考古学家的视野,而男女合葬并陪葬大量物品的墓葬越来越多,这说明部分拥有私有财产的、个体的、一夫一妻制的父权制的家庭开始出现。直到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几乎所有的氏族公社都是由这样的父权制的个体家庭组成的。

生产资料私有制,尤其是耕地的私有制已经形成。生活于河南嵩山一代的夏部落迅速发展起来并四处扩张,在对外的征伐过程中,夏部落的当权者在所占领的土地上“任土作贡”,进行行政区划并制定地方对中央的纳税制度,一个新兴的国家政权逐步确立,这个政权所到之处,依仗自己所具有的无人可以匹敌的军事优势,将本来已经私有化的土地宣布为国有,并利用分封制来进行统治。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土地国有制,土地归国家所有并严禁买卖和继承,直到西周时期,仍然是严格的土地国有制,规定“田里不鬻”。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农具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和牛耕的出现,社会生产力出现了革命性的进步,当农奴对农奴主施加于他们的经济剥

削和政治压迫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新生的生产力已经创造了足够的条件让原先被束缚在井田上的劳动者离开农奴主的控制去别的地方垦荒种地,自由地发展。春秋初年,曾经是荒郊野外的地方,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游离于井田之外的个体家庭经济。这些个体经济占有的耕地是典型意义上的私田,起初国家不承认他们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甚至不承认他们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事与愿违的是春秋初年的大多数国家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受到彼此之间的战争的庞大开支的拖累,财政入不敷出,纯粹来自公田上的赋税根本无法支撑日益庞大的战争费用开支,所以各国均忙于赋税制度的改革,鲁国的“初税亩”、晋国的“作丘赋”、秦国的“出租禾”以及齐国的“按田而税”相继出台,并正式拉开了对私田征收赋税的序幕。对私田征收赋税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缓解财政压力,但是这也意味着国家认可了人们对私田的所有权,包括占有权和使用权,过去广泛存在的以经营“私田”为生的农奴以向国家贡献赋税为代价成为私田的主人。不同的家庭拥有数量不等的耕地,用多年的积蓄购置简单的生产资料,条件好的还可以有几头耕牛,以自己的家为一个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父死子继,起早贪黑,努力于自己的农业生产之中。这就是最早的自耕农经济,我们叫它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相对农奴制的生产关系而言,自耕农经济的出现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它使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人们可以自豪地说:“这块土地是我的,我还可以把它作为最重要的家庭财富留给自己的后代。”在农业社会中,没有比土地更重要的社会财富了。在履行了自己的赋税义务后,土地上的剩余财富完全归劳动者所有。努力耕作,争取更多的收获显然会让自己发财致富,每一点劳动都被看作是为自己劳动,所以

劳动者的积极性与过去相比显然是天壤之别。齐国是较早完成这种生产关系转化的国家,齐国人的劳动积极性与过去相比确实不能同日而语,他们“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之不倦,民不惮劳苦”^①。秦国也出现劳动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②的局面,都是由于这种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人们才热衷于研究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翻耕土地、除草施肥以及有关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

新的生产关系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的高潮,在找矿、采矿技术方面,在生铁铸造、柔化及淬火技术方面,在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方面,在土壤辨析及动植物分类方面,在车辆弓箭及乐器的制作方面,在练丝染色及皮革制作方面,在中医医疗理论及技术方面,在天文历法方面,在无限时空论及点线面等几何概念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文化进入到一个空前绝后的繁荣时期,出现了老子和《道德经》、孔子和《论语》、孙子和《孙子兵法》以及其后的诸子百家,为后来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开启了智慧与文明的大门。直到西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所催生的一系列新的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高速地发展之中。西汉时期,中国所拥有的可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直到唐中期才可与之比肩。从环境较为优越且崇尚文化的个体家庭里边诞生出来了众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人才,他们的思想作为使西汉文化比之春秋战国时期又有了许多显著的进步,西汉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坚实的基石。这些史无前例的进步完全归功于小农经济,也就是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模式。直到隋唐五代时期,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这种生产模式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

① 《管子·乘马》。

② 《吕氏春秋·审分》。

的模式。

但是另一方面是,自耕农经济又是不稳定的和脆弱的。他们时常处于上升或下降的变动之中,往上走,他们可能挤进中小地主的行列,往下降,也可能破产而变成佃农。上升为地主可能需要他们连续几代人对土地所有权的积累,但是下降则可能就是几天而就的事情。造成自耕农破产的因素包括大土地所有者对他们手中的土地的侵吞,封建国家对他们过分的经济掠夺,战争以及自然灾害。这些都有可能使他们瞬间失去土地,卖儿鬻女,妻离子散。自耕农破产会造成大量的流民,这些流民的生存变得异常艰难。同时,对国家而言,税收就无从谈起;对社会而言,稳定也就不复存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特别在意保护自耕农的利益,确保自耕农经济的稳定。这些保护措施包括抑制土地兼并、蠲免租税、赈灾或由国家控制土地分配以保证耕者有其田。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存在的最肥沃的土壤应该是自耕农经济,因为这种小农经济彼此之间缺少联系,形不成统一的思想、意志和行为,缺少对君主专制的对抗力,所以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耕农经济是维护君主专制最好的手段。

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小农经济的独立性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缺少应有的联系,文化与知识的传播与发展就比较困难,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和不同知识之间的融合也较少。另外,由于它的自给自足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家庭对家庭之外的物质需求的追求不旺盛,使得社会生产的发展缺少强大的动力。还有就是生产力在个体的家庭经济中无法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受到个体家庭成员知识水平和家庭生产力水平需求的限制,生产力在个体家庭中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力的发展才可以获得强大的推动力。最为重要的还有,这种生产

模式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它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具体而言,就是让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染上了小农意识,形成了易满足、易自大的心态,并严重地影响到这个民族的身心健康。

第三节 古代科技的发展与质变的困难

一、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原因

在近代科学技术诞生之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诸如农业技术、建筑技术、纺织技术、中医学及四大发明等,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下述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为古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地域广大,南北相距约 5500 千米,跨纬度近 50 度;东西相距约 5000 千米,跨经度近 60 度。从全球看,我国处于东半球的北半球,北回归线穿越我国台湾、广东、广西和云南四个省区,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寒来暑往、四季分明的北温带,只有南部一小部分地区处于四季常青的热带,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我国地表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又加上我们所处的海陆位置是亚欧大陆的东南部,东临太平洋,我国东部广大地区为季风气候所控制,夏季炎热多雨,非常适应各种农作物的生长。从地下蕴藏来看,我国属于世界五大矿产资源国之一,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

北方的走马、吠犬,中原地区得而用之;南方的羽毛、象牙、铜精、朱砂,中原地区得而用之;东方的麻布、鱼盐、蚌蛤,中原地区得而用之;西方的皮革、牦牛尾,中原地区得而用之。这些丰富多彩的资源,为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材料。肥沃的

土地使我们的先人很早就获得了原始农业的经验；自然繁殖的蚕桑让我们的先民获得了缫丝的资源。从植物编织到布的纺织，我们有麻作为极好的原材料。广泛存在的高岭土让我们较早地使用了陶器，而且由于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地域性市场发展良好，彼此间商品交流良好，更为这些商品的生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从而也为这些商品的生产技术的提高提供了相当大的动力。

（二）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也促进了古代科技的发展

政府具有维护国家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能，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极有可能成为引领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一只手”。中国历朝历代都设立了许多主管经济发展的部门，如西周的司空，秦朝的少府，西汉的大司农、将作大匠、水衡都尉，唐朝的司农卿、少府监、军品监，宋代的五监，元朝的劝农司，明清主管经济发展的部门更多，它们都肩负着普及和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任务。汉武帝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在中国北方推行代田法和耨播；唐朝武则天亲自撰写《兆人本业记》推广农业生产经验；宋代王安石变法，其中一条措施就是农田水利法，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元朝集中农业技术人员编写《农桑辑要》，总结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明代有匠户制度和解放匠户的政策。这些无疑都是促进当时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措施。政府每一个重视科学发展的行为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上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不仅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与和平，也保障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得以世代传承、不断发展。

（三）众多科技人才的积极参与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保证

相传神农为寻找治病良药而“尝百草”，黄帝也教百姓“播种百谷”，说明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热爱科学与教育的文化传统。有非常多的热爱科学技术的人在追求科学技术进步方面孜孜以求，甚至不惜生命。战国时期的扁鹊研究内外科、妇科和小儿科，行医足迹